



失魂与还魂

中国文化的困惑与出路 谢文郁

CAT# CS101
ISBN 1-895-980-011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
第一册

失魂与还魂
—中国文化的困惑与出路

作者：谢文郁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一)
失魂与还魂—中国文化的困惑与出路

主编—温伟耀 陈荣毅

作者—谢文郁

策划—徐武豪

出版者—加拿大福音证主协会

3838 Midland Avenue, Unit 114

Scarborough, Ontario M1V 5K5, Canada

印刷者—福音证主协会
香港邮箱九五三六四号

版次—一九九五年四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一九九五加拿大福音证主协会

ISBN 1-895-980-011

目录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序言	
作者自序	
第一章：失魂——中国文化的困惑	17
(一)当代中国的认知盲点	
(二)中国文化的自我分裂	
(三)中国文化中善恶悖论	
(四)人的追求到神的救赎	
第二章：个性自由面面观	63
(一)个性自由的幻灭	
(二)至善的神引导自由	
(三)至善的神创造万有	
(四)自由真谛和神的光照	
第三章：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	99
(一)虽生犹死	
(二)心灵空虚	
(三)罪恶问题	
(四)基督赎罪——人生的活泉	
第四章：还魂——中国文化的出路	145
(一)重寻认知与判断的起点	
(二)从理性走到信仰	
(三)博爱困境与神爱世人	
(四)民主政治的由来及其归宿	
(五)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最终出路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序言

温伟耀 陈荣毅

近一百年来，中国文化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艰难变革。而这个变革又分别歧入两种偏颇。其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人文主义，坚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主张，面向西方寻求现代化意识的外力。但历史业已证明，这是不完全切合中国实情的异想。另一则是当代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人文主义，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取赖以延衍的根源。然而不可否认，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确实存在着自己难以解决的内在问题。因此，中国文化的变革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儒家（亦即当代儒家第三期）为此已经提出，造成中国文化变革偏颇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乃是长期漠视甚至拒斥基督教及其神学对整个人类文化所具有的启示性影响，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缺乏必要的对话。然而问题是，如何对话呢？对话的内容又确指什么？却尚未涉及。于是这里又出现了困惑。

中国文化变革的偏颇与困惑，在相当程度上并未引起基督教特别是华人基督徒的敏感和重视。虽然目前陆续出现了一些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比较研究，但论题相对有限，人员也显得分散，系统著述更不多见，所以整体上仍然未能摆脱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长期脱节、隔膜甚至人为对立的困局。倘若究其原因，乃是许多华人基督徒已经习惯了以往那种信仰必须全面压倒文化、或者完全摒弃文化的简单化态度，相反忽视了基督教对于中国文化以及整个世界文化的根本启示，结果严重地削弱了基督信仰及其神学文化的存在意义。落实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所谓对话上，很多时候又是通过现象范畴优劣对比的既定模式，以基督教来对立乃至进一步取代中国文化，结果也很难深入地、系统地、并且令人信服地揭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那种施予启示和接受启示的内在关系。

我们认为，中国文化的变革，亟待从全新的认知方式与价值判准上予以突破。因为无论是它自己还是事实都已经明确表示，迫切需要基督教的启示。而基督教所作的反省与回应，也只有针对中国文化变革的实际困难，才能够完美体现它的本来价值。换言之，从中国文化来迎接基督教的启示，同时又透过基督教的启示回到中国文化本身，是重新建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内在关系的可靠途径。正是从上述这个基本共识出发，我们这些国内外的中国知识份子基督徒走到一起，并且承蒙有关福音机构的资助，编辑出版了这套“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的出版宗旨，是本着福音信仰及其神学的基本立场来回应中国文化的问题。为此，基督教是首先作为特定的认知结构，来审视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内部要素之间相互对立或者彼此取代的非正常情形，进而重建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乃至人与神之间那种既区别开来又完美契合的关系。而且，基督教是作为特定的价值判准，来观照中国文化在人格培养乃至人际关系上的模糊与放任，进而确立一种符合基督教义和中国实情的道德规

范体系。根据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或者说基于这个必要的中国文化生存的本体，我们的“丛书”将积极而审慎地同目前中国文化诸多学科领域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对话，侧重解答它们在当今变革中的偏颇与未来进路中的困惑，从而使中国文化获得重新生存的基础和前进的动力，最终希望能够重建后现代时期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架构。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的探讨方法，将避免常见那种由现象类比到基督教替代中国文化的简单操作，而是注意从中国文化的实际情形来查考基督教的有关启示，同时将基督教的回应与反思并非对立地而是相应地契入中国文化的母体。事实上在这里已经开始了所谓中国本色神学文化的建设工作。因为这种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双向契合，已经全部包含和反映了中国文化在现在尤其未来的意识形态、概念范畴、构建模式和发展规律。而这正是理想中的中国本色神学所必须回答的基本命题。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的风格特征，首先是信仰纯正性，即坚持透过基督教及其神学，来反省和回应中国文化问题；但仍然鼓励一

切真诚的知识份子，从不同侧面来关心中国文化的发展或是基督教神学的发展，所以作者及其作品的立论援据，不能也不可能全部代表或者反映我们的信仰以及观念。其次是学术研究性，即尽量防止感情层面的喧泻，而力求严肃的选题、相关的论据、合理的推论、准确的语言和真实的经验。再次是一般可读性，即选题论证和表述方法上，不仅考虑应有的学术价值，更注意它的明确易懂、生动活泼和亲切感人。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无论是在中国文化史上，还是在普世福音事工史上，均是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以丛书形式展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研究。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基本建设工作。然而，因为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供借鉴，肯定给我们的研究、编辑和出版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我们相信，这套丛书蒙神的祝福，在广大基督徒和中国知识份子读者的热情扶持下，既然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那么就将会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我们感谢区应毓、梁康民、黄可顺及杨国颖四位牧师担任“丛书”的谘询委员。他们在作者、选题与书稿方面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意见。

10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

我们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献给我们的祖国，献给依稀可见曙光的二十一世纪！

一九九四年九月
于加拿大·多伦多

作者自序

谢文郁

中国新文化运动一直未能从全盘西化和坚持国粹这两种极端化路向上的怪圈中摆脱出来。尽管人们也谈论中间道路，企图把中西文化优点结合起来，但是，人们在对优点缺点的理解上无法一统，从而并没有现实地给出这中间道路究竟是怎样走法。

当代新儒学思潮努力反思，挖掘并发扬儒家精义，认为儒家文化中对个人的自我修养的强调是彻底的人文主义，如能使这一精神发扬光大，必能建立一种能同西方文化对峙的新中国文化。在新儒学思潮中，诸如“主体开发”、“内在超越”、“内圣外王”，等等说法，都着意于发挥这一精神在新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我们看

到，儒家从孔子开始提倡“克己复礼”以来，一直强调的就是“克己”。“克己”不是限制或破坏自己，相反，“克己”是要造就一种完善的人格。但什么样的人格才是完善的呢？标准又何在？孔子认为在于完善的社会秩序中，即“周礼”。孔子从未追问为什么“周礼”是完善的这样的问题。在他心中，如果个人的人格尚未完善，人们就不能追问社会秩序的完善性。这里，“克己”需要一种完善秩序，而完善秩序之发掘又需要完善人格（即“克己”）。孔子坚持个体人格的培养，相对忽略了对完善秩序的追问。这一思路于是成为儒家主导思路；在新儒家思潮中仍然如此。

然而，西方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冲击，使人们不得不在人格尚未完善之前就追问完善社会秩序的问题。譬如，当今中国的青年知识份子追求和建立民主制度，这些社会秩序理想模式，来源于人们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观察和学习。这种拿来主义，归根结蒂是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这里的证据也很充足：如无完善社会秩序，如何完善人格？被孔子淡化的社会秩序的完善性问题，在这里乃是中心关注。

这里，对峙的双方都在谈论完善性问题，但都没有认真重视完善性的真正源泉问题。个人要完善自己，那么，依据什么标准来完善自己呢？社会需要完善秩序，但根据什么来选择一种完善制度呢？具体来说，我们凭什么说已经造就了自我完善人格？凭什么说我们所进行的人格修养，是朝完善性方向进展而不是在退化？我们凭什么说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种好的制度？凭什么说我们正在选择并建设一种好的社会秩序？如果没有找到这样的标准，即非人为化的真正意义上的至善，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利说什么才是完善的人格或完善的秩序。而且，在没有这个超越人本的绝对标准的情况下，人们对完善人格的追求，和对完善秩序的执着，都可能导致个人或社会的灾难。

另外，在文化问题的讨论中，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也往往被人们忽视，这就是：分裂的自我。中国文化把人的生活一分为二：世俗生活和出世生活。儒家主管世俗生活，佛道两家提供出世生活。与儒家入流，人们有欲望，有感情，有思想，但没有灵性。士大夫对人的来世生活往往不屑一顾。如果人们发觉自己有灵性的

要求，追问死后灵魂去向，那他们只好与佛道为伍，进山修炼。中国人在所谓的统一文化（三教并流）中其实是让自我以分裂状态生存着，不断压抑自我本性的整合要求。难道人如有欲望、感情就不能有灵性的生活，而过灵性的生活就不能有欲望和感情吗？

寻找至善和整合自我，乃是当前重新建设中国文化的关键。对此，我们有什么具体途径可行呢？

受着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对理性一直抱着坚定的信心。理性成为一切判断的终极权威。然而，当人们企图找到理性作为终极权威的基础时，着眼点最后落在“自我”概念上。

“自我”作为主体，作为超越者，它完全在理性的视野之外；它不能成为理性的对象。这一点，随着西方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发展，愈来愈清楚地被揭示出来了。如果理性的基础在理性之外，我们就不能把理性当作终极权威。

由于基督教近代以来不够重视理性领域，又由于一些政治上的原因，使得基督教在中国受到排挤和压制，从而误导人们忽视基督教，甚至简

单粗暴地把它当作迷信。在大学西方思想史教学中，基督教也被剥夺得只有很小的比重。文章书籍涉及对基督教的评论时，似乎可以不负责任地对它进行非难。这种现状不但使我们无法深入地理解当代西方思想的发生发展，而且，它也严重地妨碍了中国新文化建设。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到了。

本书的宗旨，是努力从基督教及其神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某些走向。我们的分析表明，引入基督教来启示中国新文化的建设，非但不破坏中国文化，而且必然在崭新的基础上使中国文化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并引导中国文化指向确定的美好未来。本书的讨论尽管篇幅有限，但希望能引起一些共鸣，促进中国知识份子和广大基督徒更广泛、更深入地推进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结合。

一九九四年十月廿日
于美国，洛杉矶